

近 30 年来中国学界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与展望

陈 碧

一、前 言

对于如何界定“民间宗教”这一概念,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先谈谈宗教的分类问题,杨庆堃先生(C. K. Yang)曾有“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区分。他认为“制度性宗教”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它包括(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宙观的解释;(2)一种包含象征(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3)一种由人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懂,同时重视仪式性崇拜。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的宗教。”杨先生还认为,中国汉族所固有的宗教实践是一种“分散性宗教”,它与上述情况相反,没有明确的经典、教义、伦理学和严密的组织,只是“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并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功能”。也就是说,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分不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功能也许要大于“制度性宗教”。换言之,“它作为一种基层支持力量,对于世俗制度和整体的社会秩序或许十分有意义。”¹ 还有一种分类,将宗教分为“人为宗教”(man-made religion)和“自发宗教”(spontaneous religion)。前者主要指那些由某个人创立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借助于有意识的人为力量而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宗教实践;后者则主要指从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更具体一点,它是指某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信仰体系、崇拜形式、仪式等,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会有一些变化,但都与人们世代更替的日常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有时难以把它们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④

不同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指称与分析“民间宗教”这一概念,如中国台湾民族学研究所的李亦园先生、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郑志明教授等使用的是“民间宗教”,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丁荷生先生使用的是“民间道教”(popular Taoism)和“民间崇拜”(popular cults),日本的渡边欣雄先生等使用的是“民俗宗教”(folk religions),中国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主张使用“神仙教”一词。近年来,我国学者较多使用“民间信仰”(popular beliefs)一词,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部门,如民族宗教事务局也用“民间信仰”来指称中国汉人自发的宗教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无论是政府官员、研究者,还是宗教实践者,都未曾采用过“民间宗教”这一名词来描述一般民众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体系。^② 郑志明也认为,“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新兴宗教”等都是学术界定义的名词,未存在于现实的运用中,是学者为了研究与表述的方便所建构的类概念,但是对这一类概念尚

¹ 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8—270页。

^④ 《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32—424页。

^②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未达成共识,造成不少有关定义与内涵的纷争。¹

回到“民间宗教”的界说问题上来。王铭铭分析认为,现存的看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不承认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为宗教;另一类认为它们构成了“民间宗教”(popular/folk religion)。^④运用古典宗教学分类架构的学者为了把它们与制度性宗教区分开来,主张将它们与“多神信仰”、“万物有灵论”、“民俗”、“迷信”、“巫术”等归为同类。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例,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民间只有属于宗教范畴的巫术和习俗,这些民间巫术和习俗是道教的延伸,自身并不形成独立的宗教体系。^⑤相反,20世纪60年代之后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则认为,可以把中国民间的信仰和祭拜仪式看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以美国人类学者武雅士(Arthur Wolf)和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例,在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仪式》一书中,由弗里德曼撰写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文认为,中国民间的信仰和仪式看起来好像是相当散漫的文化元素的组合,但其表象之下存在一个宗教秩序(religion order)。国内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这类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分属两种类别,“民间宗教”通常指不为官方承认只能在民间求生存的教派,如一贯道、慈善堂等。^⑥以马西沙、韩秉方为例,在他们编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中,“民间宗教”专指有经书而不为官方承认的秘密教派,如弥勒大乘教、摩尼教、白莲教、无为教、闻香教、清茶门教、江南斋教、黄天教、弘阳教、八卦教、三一教与刘门教等。^⑦还有的学者持比较广义的看法,以郑志明为例,他认为“民间宗教”指的是社会中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宗教传统,包含来自于民间的通俗信仰与宗教结社。^⑧

王铭铭认为,对于社会人类学者来说,民间宗教一方面指研究对象的一个层面,另一方面指研究的途径。换言之,社会人类学者采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他们主张通过对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的宗教体系的考察,探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笔者甚为赞同王先生的观点,因此笔者所理解的“民间宗教”即如王先生所指,是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的对神、鬼、祖先的信仰,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礼仪,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⑨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宗教”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解之上的,文章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即中国民众定居东南亚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出来的较为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和文化传统。

二、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取径

尽管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东南亚社会、移民历史、经济、民众生活等关系密切,但以往国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移民历史的研究,时段也主要集中于明清、民国时期,很少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进行专门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对民间文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重视,很多学者开始探讨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问题,不仅做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个案研究,而

¹ 郑志明:《关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之我见》,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

^④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135页。

^⑤ [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3页。

^⑥ 王见川、李世伟:《战后以来台湾的“宗教研究”概述——以佛、道教与民间宗教为考查中心》,载张珣、江灿腾合编:《当代台湾宗教研究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73页。

^⑦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⑧ 郑志明:《近50年来台湾地区民间宗教研究与前瞻》,载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83页。

^⑨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139页。

且有几本较为系统的专著、论文集面世。目前,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取径大致有几种:

一是概述或探讨某个神祇或某种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播、发展与崇拜及演变,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李天锡先生为主要代表。近20多年来李先生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有关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文章,其研究对象包括妈祖信仰、吴真人信仰、城隍信仰、关帝信仰、观音信仰、女神崇拜、清水祖师信仰、广泽尊王信仰、三山国王信仰、紫霄真人、谭公信仰、孔夫子信仰等。他的研究文章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中,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八桂侨刊》《世界宗教研究》等。2001年李先生出版了专著《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该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海外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学术著作,作者采用国别和类别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诸如妈祖信仰、关帝信仰、观音信仰、城隍信仰等数十种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的背景、情况和原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其作用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并对各信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较深层次的阐释和预测。此书亦可视为李先生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晶。此外,李先生的上述一些文章亦被《宗教与文化》一书第五编《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收录。

此类文章还有很多。如聂德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保生大帝信仰》与《青礁慈济宫与海外华侨》就分别论述了保生大帝信仰和吴真人信仰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渊源及传播、发展。较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陈志明的《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和郑志明的《客家社会大伯公信仰在东南亚的发展》。前者以大伯公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对中国的土地神的延续与变革,作者将分析置于华人社会土地神观念的发展脉络中,分析现今东南亚华人的土地与圣迹的神祇之信仰,探讨了华人的土地神观念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的延续、发挥与演变,研究了华人民间宗教的变迁问题。后者则从客家社会与大伯公信仰谈起,追究其在传统天神、地祇与人鬼信仰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二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等角度探讨各种宗教信仰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与发展,分析各国的宗教政策、华人社会和文化特征等。此类文章数量最多,以华侨大学张禹东先生为主要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张先生陆续在国内多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海外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张先生还出版了专著《宗教现象的文化学研究》并与黄海德一起主编了《宗教与文化》一书,书中亦收录了张先生很多研究文章。张先生并不刻意研究某种专门的宗教信仰,其论文主要着眼于民众信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宗教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华侨、华人的宗教文化的价值构成等方面,如《新加坡多元宗教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的基本构成及其变动的原由与前景》《试论东南亚华人宗教的基本特征》《马来亚的华人宗教文化》《印尼全面同化政策下的华人宗教文化》《华侨华人传统宗教及其现代转化》《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伦理思想的价值构成》《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例的研究》《东南亚华侨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等。张先生还提出了“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界说,认为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是指海外华侨、华人所信奉的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等宗教文化,^④并以此对华人宗教文化展开研究。

相关文章还有很多。如许国栋的《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与《从华人宗教信仰剖析泰国的“同化政策”》,分别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了印尼与泰国的同化政策。相对而言,研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家的华人宗教信仰文化及政策的文章较多,如陈衍德的《试论菲华社会的宗教融合》詹冠群的《清水祖师信仰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影响》袁丁的

¹ 黄海德、张禹东主编:《宗教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④ 张禹东:《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伦理思想的价值构成》,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缅甸瓦城华侨观音寺研究》、聂德宁的《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高伟浓的《东南亚华人的大伯公与土地神崇拜探析——以泰国为例》、谭志词的《关公崇拜在越南》等。以郑志明的《泰国华人社会与宗教》一文为例，该文章从分析泰国华人社会的“五缘”文化入手，考察其在华人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经济网络中以及在社会人际群体凝聚与沟通中的作用，考察宗教信仰尤其是民间宗教对于华人社会的重大作用，作者希望以宏观的视野勾划出泰国华人社会与宗教互动的整体面貌，以给后继者提供研究的参考。

三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多学科的视野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讨论东南亚华人的神、鬼、祖先信仰和象征体系等，并透过鬼神信仰、鬼神世界来研究活人世界，探究华人社会和文化特征，以厦门大学曾玲博士为主要代表。曾博士先后出版了专著《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与《越洋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近年来，曾博士还陆续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论文，如《“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阴阳之间——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新加坡华人的龙牌崇拜初探——兼与祖先崇拜比较》《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社群边界内的“神明”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妈祖信仰研究》《坟山崇拜与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之整合》等。曾博士的主要田野调查点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等问题的研究上用力甚勤，还主编出版了一套资料汇编。¹ 因为自身的历史学科背景，又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海外田野调查资料，曾博士的相关研究相当深入，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四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华人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从文化适应等多个角度来探讨华人宗教问题，此类文章数量不多，代表作有陈衍德的《试析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经济动机》、王文钦的《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黄新宪的《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渊源联系》、黄世杰和陈英桃的《中越边境鸡鬼之谜的人类学透视》、郑一省的《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的民俗活动》、郑文标和张禹东的《华人宗教与“华人经济”的共同特征》、旃媛媛的《试论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对当地文化的适应》、张龙林的《东南亚华人宗教问题初探——定义、历史分期与主要特征》、农学冠的《神龟信仰：中越民间文化中的一个母题》等。以袁丁的《持续与变迁——人口统计中反映的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的变化》及曹云华的《宗教信仰对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为例，袁丁的文章从1980年以来有关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的调查入手，运用新加坡人口统计数据等分析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与变迁。曹云华的文章则通过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者，即华人穆斯林、华人基督徒、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来研究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问题，认为东南亚华人如果保持中华文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提倡信仰华人传统宗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三、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缺失与前瞻

上文的回顾并非是全景式的，但也能大体上反映出目前国内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基本状况。总体上而言，概述东南亚华人的民间宗教的渊源、传播与发展前景，从历史学、人类学、移民文化等角度考察各种信仰在各国的发展，探讨各国的宗教政策和华人社会的文化特征等，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失：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于

¹ 曾玲主编：《新加坡华裔丛书：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一、之二、之三》（中、英文），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

那些影响较大的神,如妈祖、清水祖师、大伯公、吴真人等,而对那些在较小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神以及那些未被纳入系统的神则缺乏研究;目前学界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尚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对各宗教信仰的人群、仪式、组织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缺乏细致分析,在讨论国家权力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时只关注各国的同化政策,而对华人社会的本地化及其对所在国的认同等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忽视了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华人宗教与东南亚本土宗教之间存在的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因素。另外,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从事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研究者相对集中于南方的一些院校及研究单位,如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和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具有明显的区域与学科特色。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尚没有专门的宗教研究专业针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展开研究,在研究取向上也多是国内视野,将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因此,在学理和方法论上都有待深入的发掘。

笔者认为,今后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应在历史的脉络中研究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当地社会的制度、本土宗教的关系,研究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之间的互动;应关注社会不同群体、阶层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态度,对宗教仪式、神话甚至巫术等象征体系展开深层次的研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关注东南亚华人的宗教认同、血缘认同、祖籍地认同以及所在国认同,并分析其原因和实践;应对那些未被纳入体系的神和新兴宗教展开研究,探究其发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及与其他宗教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进行多学科视野的研究,从宗教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等学科视野深入研究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应打破区域研究的瓶颈,壮大研究队伍。

民间宗教文化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是社会文化的宝贵资产,它不仅为民众提供了精神领域的信仰寄托,还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人际活动。民间宗教是一个想象与现实交汇的领域,神祇及其相关的象征、仪式与民众生活,区域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息息相关,对它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权力、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的关系以及东南亚华人与土著居民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当下,传统与现代的社会结构急剧变迁,东南亚华人对待民间宗教有着不少复杂的心态,人们的宗教情感也逐渐变得莫名和暧昧,正处于不知如何进退的窘境,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对东南亚华人的宗教研究是相当迫切的。

国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30年以来这一时段,各方学者跨越不同的学术领域积极投入其中,正显示出民间宗教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国内学者对于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或许能为认识现代东南亚华人社会和东南亚世界提供新的视角。一个研究领域的开创及至壮大,需要长期的积累与探索,未来的研究需要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陈碧,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黄海慧]